

导 言 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

1 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转换

社会学问世以来，对社会进行结构分析即把社会作为一个由要素与系统、局部与整体相互依赖、彼此制约而组成的有机体进行分析，一直是各流派学者所共有的研究视角，并由此形成诸多有关社会结构的主张与论说。其中，包括 A. 孔德首倡、H. 斯宾塞细化的“社会有机体论”，即认为人类社会如同生物一样，也属于有机体，有着相同的结构，具有类似的要素构件，并在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M·韦伯的“科层组织制度论”，即把工业社会看作是一个以严密组织和分等级划部门、合理分工的管理制度为基础的结构模式，并以忠诚规章准则、遵循办事程序、明确管理权限和服从管理制度为特征；由 A·迪尔凯姆首倡、中经 B·马林诺夫斯基和 A·R·布朗深化，最终由 T·帕森斯与 R·K·默顿等人集大成的“结构功能主义均衡论”，即把整个社会视为由各类群体、各种事物、各项制度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每一部分都因其特殊功能而应当存在，社会系统之所以协调、稳定、均衡发展，是由于找到了一种把各个部分联贯起来的结构方法，并由此满足各部分的功能需求。以上的主张与论说，在社会学史上都占有相应的地位，也曾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又包含诸多不足。然而，就社会结构的科学界定而言，以上诸说以及后世各主张中还没有一个社会学家超过马克思的水平。正如当代美国社会学家 J·C·亚历山大所指出的：“马克思是关于社会结构的最大的理论家。”^①马克思为后来的理性主义者建立关于社会结构理论奠定了基调。^①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结构是人们在人口、物质

^① J. C. Alexander: *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P18、19.

再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组合方式。其中包括人们通过生育即在“他人生活的生产”中所发生的夫妻关系以及父子(女)母子(女)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组合表现为社会家庭结构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结构；也包括人们通过劳动即在“自己生活的生产”中，所发生并与社会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组合表现为社会经济结构；还包括在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上层建筑，以及人们在其中结成的政治关系、组织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三个社会发展基本要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为社会整体结构。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新旧社会形态的演化与更替，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运动的结果，因而社会整体结构的转换，就成为人类历史演变的根本动力与主要标志。社会发展的程度与水平，主要取决于社会结构转换的进程、状态与结果。马克思曾把这种宏观社会历史分析的社会结构理论，称之为“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并强调指出，认识和判断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① 马克思这些精辟论述，为我们把握社会结构转换理论，提供了思想武器与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不仅从宏观角度揭示人类社会整体结构的演进历史，把它看成是一个时间上延续、空间上拓展的动态过程，逐一地描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将其视为一个个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特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前后相继的演进序列，并强调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社会结构转换中，人民群众是主体，革命性的制度变革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34页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是动力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前进方向。同时 他还在《资本论》等著作中 从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入手 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作了典型解剖 在全面论述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 就社会分体结构作了一系列科学界定。

在社会分体结构方面 马克思着眼于整体与局部、母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辩证分析 按照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衍化的总体思路，论述了与社会整体结构密切相关的经济结构、权力结构、文化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生态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首先，对经济结构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了全面分析，并把它看成是社会整体结构的基础部分。它既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 又受后者的制约或掣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① 这里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既包括生产的承担者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财产结构、管理结构、群体结构；还包括生产承担者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要素组合，如人的智力结构、生产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等。上述三种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分体结构的总和，就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西方社会学家将经济结构大多局限于产业结构的主张相比，马克思揭示的同一范畴内涵要深刻得多，其外延要宽广得多。

其次，对阶级、阶层结构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作了全面阐述，并把它视为社会整体结构的主体部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了“到目前为止的有文字记载的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925 页。

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著名论断，因而从总体上肯定了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①，同时还从社会历史演进的视角，逐一论述了过去各个历史时代中不同的阶级、阶层等第的组合方式，重点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和阶层、集团及其历史地位，并从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一基点着眼，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必然逐步消亡这一趋势作了科学预测，其中蕴涵着未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动的趋向。

再次对政治权力结构尤其是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构作了深入界定。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指出：“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一般政治。”^②不久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则从财产占有性质与阶级对立状况，以及经济与政治关系角度，得出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这一结论。^③不仅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密切合作下，还对私有制与国家起源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对政治权力的起源、国家权力的组合方式、演变趋势作了广泛论证，为我们把握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实质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指针。

其四，对文化结构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结构的实质及其衍化趋势作了全面界定。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这一共同规律，从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3页。

得出了“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重要结论，并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这一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诸多文化结构提供了指针。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就狭义的文化结构包括科技、教育、文艺结构作出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如培育工人阶级的大学生、生产力应包括技术发展在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论述，为我们建设与完善现代的文化结构，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最后，对生态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作了全面探索和科学预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历史的主体是人，人要生存、发展，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人类社会要生存，就要从事物质生产，就须同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资源基础与空间环境即自然界打交道，即不能消极地适应自然，而应科学地认识、积极地利用自然，并在认识、利用以反作用于自然界中，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形成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机结合的整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③这是自古以来诸多先人所追求的理想生态结构。但是，马克思也强调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原有的生态结构正面临威胁。为此，马克思提出两个具有远见的生态范畴。一个是“人化自然”范畴。^④其内涵是指人类在认识、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按照人类愿望经过物质生产改变自然资源的形态、结构，使之成为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270～2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1～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2 卷，第 122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2 卷，第 95、126 页。

足人类需求的物质资料。这种“人化自然”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但是，如果人类的生产行为、消费行为和生活行为不当，超过自然资源的供给程度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就将导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和整个生态结构失衡。为此，马克思又提出另一个“非人化”范畴。其内涵是指人类在认识利用自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以造福于人类的过程中，由于“人化自然”不当，造成严重的大地、水源、空气污染，自然界反过来惩罚人类并使之面对着生存、发展的严峻挑战，人类自身处于一种非人的状态。这两个科学范畴，为全球调整生态结构、大力保护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完善生态社会学作了超前预证。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著作中，就未来社会个体素质结构，包括个体的生活质量、智力与知识水平、人才潜能的发挥、美满婚姻的实现与个体幸福的追求等方面，作了科学的预测与论证。就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结构的界定是相当全面而又非常科学的。其对社会整体结构的界定，为理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其对社会分体结构以及社会个体结构的分析，不仅充实了理论社会学的内涵与外延，而且为应用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

结构转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渐次生成的一个特定范畴。其理论内涵，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即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中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与发展。它既是战后发展中国家总结发展经验教训的必然结论，也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理论的补充、完善与发展。这一特定范畴的生成，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

它以发展中国家对发展道路的深入探索为契机。战后 50~

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了由西方学者倡导的以单一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为战略，以增加剩余分配、最终消灭贫困为目标。它集中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增强经济实力，以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然而，实践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关系的变革，结果产值上去了，总量增长了，却陷入“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度增长、低度发展”的困境。人口总量急剧上升，城市恶性膨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严重滞后，政治与行政体制日益僵化，国营、私营部门效率低下，收入与分配愈来愈不平等，不仅没有促进社会发展，反而带来了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和社会生活严重失序等弊端，直接制约着经济的稳定增长。正是这种客观情势，迫使发展中国家作出选择，将战略重点转向结构变革，以实现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转换。

它以赶超型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为基础。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启动时，一般都借鉴甚至模仿西方现代化道路，并以尽快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为目标。随着赶超型现代化的启动，不可避免地要从外部输入甚至全盘照搬种种现代经济模式、社会价值、文化因素。这种模式的异质化与文化的外来化，势必与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公众心态结构产生强力冲击，处理不当、控制不力还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甚至阻滞现代化进程。同时，推行西方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城市元产业过于集中、人口过度膨胀、发展过度繁荣，而相对滞后、衰败的农村元则蕴藏着强烈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直到引发冲突和社会不安，加之资源有限、基础薄弱，来自下层与上层对现代化的过高期望，急功近利的社会政策，超越发展阶段的公众心态，使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常处于一种曲折、不稳甚至中断的状态。正是这种来自各方面的强力冲击，

对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在全面而正确地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成果的同时 如何保持、弘扬本国、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 使两者异质兼容、优势互补 以确保结构转换顺利、稳妥地推进。

它以异军突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范式。 60~70年代崛起的东方国家或地区 尤其是东亚‘四小龙’的实践证明 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 绝不意味着要与历史、文化传统彻底决裂，用所谓外来的西方文明取代传统的东方文明。相反，发挥传统优势 弘扬以自力更生、群体奋斗、严格自律、艰苦创业的东方文明 不仅不会影响、妨碍反而为稳定、有序地推进结构变革 以早日达到现代化目标，注入了强劲的文化动力，增强了内在的凝聚力、向心力。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换 既非绝对的排异 又不是无原则的非我，而是一个以我为主，使西方的工业文明与东方的精神文明、道德传统兼容、互补、融合的过程 同时 也是一个主动借鉴、吸收、消化一切外来文明成果 弘扬优秀历史传统 以不断创新实现新的腾飞的过程。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思考，自 6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专家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极其宝贵的探索，逐步地在结构转换问题上形成共识，如实地将其看成是一种既反映、体现现代共同要求而又独具本国特色的结构变革。这种发展中国家独特的结构变革，尽管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然而，从总体上却有共同的特征。

一是结构转换的自主性。发展中国家，是在全球性竞争日趋加剧，发展空间相对狭小，发达国家又将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强加于自己的特定环境中 开始结构转换的 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必要的外援 只能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广泛动员 调动内部资源 弘扬传统优势 及时捕捉发展机遇乘势而上 以在内外

条件相当有利的情况下 自主地推进结构变革 逐步闯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二是结构转换的系统性。它属于人类社会持续进行的结构性变动的一个独特环节 同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相比 它既是一种“补课”又具有赶超特征。从“补课”的要求看 发展中国家不仅仅要全面推进社会分体结构的转换，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生态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的综合变革，尤应注重社会个体素质结构的转换，包括教育结构、科技结构、智力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全面变革，以使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结构过渡与转换。从“赶超”的要求看，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换实际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即在加速实现工业化以深化传统结构变革的同时，还应从跨世纪发展的高度，顺应全球正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和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这一历史大势，将工业社会结构的建构和生态社会结构的重组、把现代化的达标和要素结构的知识化有机结合一体推进，以尽快跟上全球发展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 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换 是一项“毕其功于一役”因而更为艰难的系统工程。

三是结构转移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结构转换，不仅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承担的使命十分艰难，而且要全面确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涉及领域也极为广泛。其中，包括体制变革、机制更新、要素流动、利益调整、阶层分化、观念嬗变、生产模式转换、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完善以及个体价值体系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换，是一种具有广泛规模、深刻影响、整体性质、革命意义的吐故纳新。决策者、管理者是否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革故鼎新的勇气 破旧立新的能力 异质兼容的本领，将直接制约甚至左右结构转换的速率与水平。

四是结构转换的渐进性。发展中国家结构转换实质启动时，

其现有基础较为薄弱，公众素质相对低下，管理手段不尽完备，传统积淀相当厚重，因而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能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必须循序渐进、渐次加速、分步实施。这不仅表现在结构转换的整体部署，应贯彻合乎本国或本地区具体实际的战略方针，而且在实际推进中，还应逐步采取适应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的战术措施，以提高结构转换措施的可行性、可信度，确保社会运行的相对稳定。

2. 中国结构转换的主要特征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换的进程，早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时即已发轫，上世纪 60 年代着手创办现代工业时就已启动，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旧式生产方式的束缚，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思想一度失误，因而中断或延缓了这一进程，直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启动并加速推进。在这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因而又有诸多不同于其他发展国家的特殊性。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结构转换并非社会形态的更替，也不是社会根本制度或社会整体结构的彻底变动，而是具体制度或社会分体结构的自我更新。其中，包括产权结构、企业结构、产业结构、社区结构、阶层结构、行政结构、文化结构、生态结构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社会结构转换，由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业已确立并日渐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得到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步地推进，因而具有持续、稳定、协调等特征。不仅如此，转换的途径也各异，主要表现为农业结构向非农结构转换、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转换、单一结构向多元

结构转换、生存结构向发展结构转换，并以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换为背景，使之贯串于社会结构变革的始终。

除总体上的相同外，在实际进程中，中国的结构转换还有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特征。

首先，结构变动的切口不同，由此引发的社会要素重组也各异。中国的结构转换，是从经济结构尤其是由占人口总数 80% 的农村经济结构率先变革发端，进而触及深层次的城乡社会结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换，又促进、推动、深化了政治、组织、文化结构的变革，并由此引发体制转轨，促进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经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地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这种结构变动和体制转换的直接成果是社会要素重新组合。其中，包括产权要素重组，即由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兼容互补的多元混合型产权结构，取代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单一公有产权结构，由此推动金融、财税、价格、分配、流通、外贸管理体制变革；机制要素重组，即由已初步形成并富于弹性、活力与充满竞争、激励氛围的异质性市场机制体系，取代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均质性计划机制体系，由此加速劳力、财力、物力、信息的流动和区域职业群体的分化；组织要素重组，即由统分结合、权力分散为特征的党政分工、政企分开体制，取代高度集权、高度统一的党政合一、政社合一、政企合一体制，由此导致党政组织的科学化和诸多民间专业组织、公益组织、工商组织、服务组织、社团组织的独立化、分散化；观念要素重组，即由高度异质、异构、多向且呈开放、进取状态的思维方式，取代高度同质、同构、单向且呈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由此引发诸多思维观念碰撞、价值取向分野、伦理准则歧异、认识判断不一，如此等等。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的体制转换，正处于一个关节点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虽已打破却并未全然

消失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已初具规模 却还未最终确立 新旧体制并存、交替将持续一段时间 体制性的磨擦、矛盾及至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因此 强化调控、规范竞争、正视差异、调整利益 就成为深化结构转换、填补体制空白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发动改革的主体不同，由此引发的权力要素重组也各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党与政府发动的，并在其强力推动下进行。它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符合结构转换大势，使绝大多数居民受益，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这场市场取向改革，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发挥了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作用 形成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格局。这种“二元调控、双向推动”并行不悖的直接产物，是传统权力要素重新组合。其中，包括政府管理功能要素重组 由政府对企业的产、供、销与人、财、物统包统揽、统收统支的直接管理 转向靠计划引路、政策导向、法律规范、经济杠杆、协调整合与必要的行政干预进行间接管理；政府服务功能要素重组，由企业为政府服务，成为附庸，转向政府为企业人才、科技、信息、法规、咨询等在内的全程服务 政府配置功能要素重组，由政府代行市场行为专司经济资源的配置，转向消除“市场缺陷”强化非经济资源如法规资源、社会资源、环境资源的配置与优化 以为市场运营创造一个公正、公平、公开和平等竞争的环境。就如同政府行为不是万能的一样，市场行为也不可能包罗万象，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经济仍然是非均衡经济，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社会又特别注重个人情感认同、伦理沟通，而忽视竞赛规则、法制权威的情况下 完善二元调控、强化二元推动 实属全面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全力加速结构转换的关键一着。

再次 城乡关系变动的起点不同 由此引发的社区要素重组也各异。中国社会结构变动，首先从农村发端，并以乡村工业异军

突起为先导 在它的推动下 大大地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 直接生成诸多历史性变革。由于乡村工业化的强力推动,作为乡村社区主体的农民 经由“离土不离乡”进而“离土又离乡”其收入来源、活动空间、户籍身份、思维方式、生活质量 正在朝着非农化、集镇化方向发展 作为传统社区载体的乡村集镇 其设施、功能、地位与作用 正朝着中、小城市或中心集镇方向演变。与之相对应 作为现代社区载体的市区,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政策方面的局限,面对乡村工业超常发展、小城镇规模不断扩充所形成的又一轮“乡村包围城市”态势 其实力增长、功能开发、设施到位、生态优化 都明显地滞后 从而加大了城市现代化的难度与压力 作为连城接乡的中介社区城镇 由于发展超前、规划滞后、规模失控、布局无序,导致耕地锐减、物耗过度、生态失衡、环境污染 直接制约着城镇现代化的速率与水准。因此,进一步地完善城乡双向运动、强化要素重组 在切实抓好城、镇、村整体、科学布局基础上 渐次形成以大中城市为龙头、小城市与小城镇为中介,以广袤村落为腹地的产业梯度转换、功能合理分工、设施衔接配套、环境洁净、舒适的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应是社区结构转换尤其是发达地区社区结构转换的最佳选择。

最后,结构变动的轨迹不同,由此引发的区际要素重组也各异。中国结构转换的实质性启动,有一条相当鲜明的运行轨迹,即纵向由南(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区)向北(“三北”沿边地区)渐次扩大开放 横向由东(东部沿海地区)向西(中、西部地区)不断深化改革。与这条轨迹相适应 形成了东部、特区、沿海地区先发展、快发展与中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后发展、慢发展同时并存的格局。正是这种发展梯级的不平衡,产生了诸多发展差异。如东、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差异 特区、开放城市与其他地区、城市的政策差异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区差异 劳动密集型与资金技术密

集型的产业差异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之间观念、技能等方面的素质差异，等等。这种发展差异，直接引发了生产要素重组。其中包括劳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人口 由西向东、从北至南无序流动 劳动密集型产业 由东向西梯度转移 资源、资金与技术、管理 在东西、南北之间双向配置 东西联手、南北合作、城乡互补所酿成的要素多元组合，等等。上述要素重组，为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改变经济非均衡运作格局，促进社会结构的稳定，都显示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要素重组中也蕴涵着不少矛盾乃至冲突。如劳动人口无序流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漫延，资源双向配置中的经济欺诈行为的增长 东西联手、南北合作、城乡互支中的行业、资源垄断和权力滥用所引发的贪污、受贿等腐败之风抬头，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传统体制、结构凝固化的平衡，而使内在的不平衡外化，是结构变动、体制转换不可或缺的条件；面对日渐扩大的发展差异和不平衡，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以在不平衡中寻求某种相对平衡，以确保社会稳定，又是深化结构转换、确立现代体制的重要一环。^①

3. 区域结构变动的正面效应及其突出矛盾

同全国、全省一样 苏州、无锡、常州（以下简称苏南或苏锡常）的社会发展即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由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转换。所不同的是，在这一方面苏南又独具特色。它充分地利用了农村率先变革这一独特优势，使乡村工业迅速崛起，从而大大地加速了农村乃至整个区域经济结

参见陆学艺、景天魁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4～53 页。

构转换的进程 并进而触及深层次的城乡社区变革 经济、社会结构转换 又深化了其他领域的结构变动 由此引起体制转轨、机制创新、利益调整、群体重组、阶层分化、观念嬗变 使之真正成为 一种具有深远影响、广泛规模、整体性质、革命意义的吐故纳新。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成如下结构变动的正面效应。

第一，区域性人口结构变动。人口结构包括人口的总量规模及其年龄、性别、素质结构 是社会结构最基础的部分 因为人们总是带着上述属性参与社会生活、投入社会活动，并深受上述属性的制约与影响。正由于如此，人口结构的变动及其走向，就成为人们判别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首要尺度。

从人口总量控制看 苏南在经历以“高(出生率)一低(死亡率)一高(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迅猛增长阶段(1949—1965年) 和以“中(出生率)一低(死亡率)一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平稳增长阶段之后 进入 90 年代后即朝着以“低(出生率)一低(死亡率)一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现代型生育阶段转换(1991—1998)。不同于前两个阶段，长期处于中位增长状态的出生率，在本期一直保持着大幅、持续、平稳下落之势，1997 年苏、锡、常三市分别达到 7.01‰、8.68‰ 和 14.32‰，由于死亡率一直稳定在 7‰ 左右，因而自然增长率始终没有超出 10‰ 到 1997 年下落到 0.07‰、2.23‰ 和 8.41‰，其中苏州于翌年首次进入负增长(-0.28‰)，这不仅大大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其总体特征表现为发达国家已率先进入老年型社会，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处于年轻型阶段。作为中国先发达地区的苏南也不例外，随着少儿(0~14岁)绝对量和相对量明显下降，65岁及以上人口的总量及比重亦呈逐年上升之势。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